东南学术

DONG NAN XUE SHU

（双月刊）

编辑委员会

主　　任：王碧秀　吕良弼

副 主 任：马照南　杨健民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照南　王　旭　王碧秀　邓力平　吕良弼
庄国土　庄宗明　关家麟　刘海峰　刘登翰
汪文顶　汪征鲁　李建平　吴承业　杨益生
杨健民　张　馨　张春霞　陈支平　陈甬军
陈国宏　陈明森　陈振明　陈培爱　林继中
郑又贤　南　帆　郭铁民　徐晓望　徐梦秋
黄鸣奋　梁新潮　曾五一　蔡金发　廖少廉
廖泉文　廖益新　潘叔明

社　　长：马照南

总 编 辑：杨健民

Dongnan xueshu [Southeast Academic Research. Journal of Fujian Social Sciences Society] 2005, 3, S. 44-53)

东南学术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4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严书翰

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

特邀编审:陈振明

9 以公共职能为目标,加快政府改革进程 高尚全 全 毅
19 转型期我国公共管理面临的十大挑战 肖文涛
31 国家与利益
——现代西方的四种国家观 陈炳辉
37 论政府责任及其实现控制机制 吕景城

专题探讨:后现代主义情境中的历史编纂

特邀主持人:陈 新

44 后现代主义观点下的历史启蒙:"新费解"时代的历史学
[德]耶尔恩·吕森 著 赵协真 译 陈新 校
54 历史解释中的形式主义与情境主义策略
[美]海登·怀特 著 黄红霞 译 陈新 校
67 历史编纂与后现代主义
[荷]弗兰克·安克斯密特 著 陈新 译 黄红霞 校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8—1569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BM6794
国内统一刊号:
CN 35—1197/C
国内总发行:
福州市报刊发行局
全国各地邮局
均可订阅(零售)
国内发行代号:34—82
出版日期:
2005 年 5 月 20 日
榕工商广字:02042 号
国内定价:8.00 元

双月刊
2005年第3期(总第183期)
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

78 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构建互利共赢的协作支撑体系的几个问题 郭铁民

85 外资企业市场进入行为与市场结构效应
——以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资为例 陈明森

98 县级财政支出结构与县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石爱虎 梁新潮

106 我国失业原因和就业对策探索 周培元

112 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
——与王东、刘军先生商榷 叶志坚

121 启蒙、现代性与现代风险社会
——对康德、福柯、吉登斯之思想的内在性寻思 许斗斗

127 视角的转换:现代国家刑罚权的反思 彭 辉

134 环境权新论 邹 雄

144 论闽南民间舞蹈的多源性特征 蔡湘江

154 伊泽修二与台湾殖民教育的发端 黄新宪

164 注重把握地方教育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读王豫生主编《福建教育史》 薛 东

编 辑:
《东南学术》编辑部
出 版:
东南学术杂志社
地 址:
福州市柳河路18号
邮 编:
350001
电 话:
0591-83739507
传 真:
0591-83704540
印 刷:
福州市力人彩印有限公司
电子信箱:
(文史哲)
cw@fjskl.com.cn
(经政法社)
dnxsh @ fjskl.com.cn

期刊基本参数:CN35-1197/C*1988*b*16*168*zh*p¥8.00*2000*18*2005-03

东南学术

SOUTHEAST ACADEMIC RESEARCH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3 2005

后现代主义观点下的历史启蒙："新费解"时代的历史学

[德]耶尔恩·吕森 著　赵协真 译　陈新 校

理性入睡产生怪物。

——戈雅

摘要：历史思想现代化的演变也可以概括为一部意义缺陷或失落的历史，如今，它面临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后现代主义思想谴责历史思想现代化中的意义缺陷。历史思想在根本上处于危险境地的是方法论上的合理性，它把历史构建为一门相当独立于它的各种变体的科学学科。正是这种合理性，作为人类生活实践之文化定位的原则，已经导致了这种合理性既无法对付又费解的境况。不过，历史编纂中的后现代转向也存在定位缺陷，我们应当唤醒历史理性来弥补这种定位缺陷。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理性；历史思想；历史主义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5)03－0044－10

一、后现代主义作为对历史编纂学的一种挑战

无论您怎样具体定义最近如此吸引知识分子的那种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现象，它对历史学家和他们的技艺都呈现为一种挑战。"后"这一前缀暗示着存在一种对于那些把当今的社会与文化关系归入"现代"之列的文化解释的普遍不满。"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已经受到了质疑，对于"后现代主义"这一新兴现象的持续讨论也预示着需要种种新的历史眼光。

这种迫切的需要植根于对当今社会与文化现实的体验，这些体验彻底地置疑那些先前已由"现代性"这个术语所逐渐选定的那些解释世界与自我的有效参照点。在这种情形下，"进步"的概念起到了现代历史意识的基本观念的作用，这使得把现代社会的历史学模型解释为一种积极的发展成为可能，同时也为社会活动提供了一个基础。从这种历史视角来看，未来，带着它美好的承诺——作为对自然的支配、富足、民主的政治参与以及文化启蒙的产物而达到的生活品质的空前水平——向我们招手。

然而，与此同时，对于现代化的各种后果的体验已经搅乱了这种感受，把它置于一种不同

作者简介：Jorn Rüsen，Historical Enlightment in the Light of Postermodernism：History in the Age of the"New Unintelligibility"，作者为德国埃森文化科学研究所所长，当代著名历史哲学家。本文由作者授权发表，鉴于篇幅所限，本文原注释基本省略。

的与令人怀疑的境地。它阴暗的内面是不祥的:通过科学与技术对自然的支配和与之相伴的掠夺使人类生存的基本前提受到摧毁的危险。作为理性化与祛魅的结果,起着调和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作用的文化意义资源正在耗尽、枯竭。

这些都是意义的各种潜在可能性,它们在启蒙的名义下,曾经一度向人类承诺在一个人性化了的生活世界中一种自由的并且与其自身的令人满意的关系。现在,启蒙的那个承诺——通过人类理性的自由运用,不受迷信、专制、封建制度的不平等与经济落后的妨碍,在社会中去创造出一种自决生存的基础——不仅显得像一个未曾得到兑现的誓约,而且像是一个恰好变成了它的反面的期望。人类的理性,摆脱了限制其应用的传统主义的束缚,已经形成了新的控制手段,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平等和新的经济依赖。最终它也已经在各种不同形式的意义虚无体验中导致了一种新的冲突。启蒙的宏伟计划如今被宣告为一个失败:"文明的最高意义(Sinn)变异成了它的极度癫狂(Wahnsinn)"。

现代性作为一种威胁性的混乱:这种体验动摇了历史解释的各种模式,而我们的文化生活形式正是尝试通过这些模式来解释自身,以一种使未来变得有意义的方式来联系过去,同时把当前的行为定位在一个时间性框架内。

一旦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人们对作为文化自我解释的关键概念的现代性不再有任何基本共识,历史也就显然失去了它作为工具的价值。历史作为一种工具的功能在于,通过记忆为这些社会创造一种自我形象,以及把这些社会的未来勾勒成激励行动的因素,如今,这样的功能被削弱了。随着现代性所已经经受的文化权威的丧失,历史自身也受到了丧失所有意义的威胁。取而代之的是,其它的各种选择出现了,以此满足人类生活实践在时间中对于意义取向的要求。神话的或准神话的思维就是一个这样的选择。

能够在文化定位的框架内为当今社会生活实践行为作指导的历史形象的这种坍塌,其征兆之一就是复兴的通俗性,这正是当前后历史(post - histoire)概念所欣赏的。后历史的概念与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持续不断的讨论与争议密切相关。后历史假设了一种彻底的断裂:不仅仅是在目前的社会现实情形下不存在切实可行的历史视角。毋宁说,像历史这样的范畴根本不再能够提供任何形式的定位了。从时间的推移方面来看,人们自身的生活实践似乎显得与各种把历史变得有意义的历史序列的构想格格不入。

后历史的概念是后现代思想的一种表达。它将把作为后现代的现时代时间性范畴化推向极致。作为把现时代从现代性框架中移走的一个后果,一种定位潜力丧失了,而现代性框架有能力为我们时代的生活实践提供一个时间性方向。这样的历史思想提出了把握决定着人类世界中时间性变化方向的那些因素的必要性。这种理解被看作引导构成认同的自我解释与行为之意向的一个基本特征。后历史是针对现代性的一种历史类别的否定。它中止了这样一种发展,在其中过去将自身呈现为充满意义与重要性的历史。以这样一种过去来看,未来,作为更新充满意义的、创造性的活动的一种可能性,是可筹划的。

后历史获得一种同历史意义的一个特定参数,即变化的参数相平衡的可信性。后历史主张,变化,作为一个时间性运动的有历史意义的概念,早就倒退成了灾难,或者已经变成了一台空转着的马达的外壳,这台马达的所有齿轮都在转动,却并无任何有意义的改变。后历史认为,人类精神的各种力量——它们产生品质上新的和有价值的东西——不复在理性 - 功能系统的自主运动中起任何作用了;这或者是由于这些力量的瘫痪,或者仅仅是因为它们已经变得无效与多余。

对于进步观念的那种革命式或进化式图景而言,后历史持一种怀疑论的相反的图景。进

步的观念在各种各样的形式中,基本上都预想了一个通过重新塑造世界而达到的人类最终的解放。在后历史的概念化过程中,进步的动力已经为一种文化的结晶形式所取代,它冻结并重新引导了渴求自由的主体性的种种驱动力。它不仅使这些力显得多余;更应该说,它还通过固化了的制度机构的结构力量来压制和排除它们。

想想进步,它总是在这样一种企图中包含了历史的全部,让其行动着的主体们觉得这是可信的,确实有可能产生实质的变化,有可能通过目的性行为去改善世界。如今既然这种行为所渴望的结果并未成为现实,人们便被迫得出一个极端的结论:它们的缺席只能被视为这样一种历史的终结。自由王国的梦想变成了精神流浪的梦魇:那些被赋予了终极洞见、被夺去了一切幻觉的人,在理性化与祛魅的后果留下的,如今耗尽了任何意义潜力,正在蔓延的荒野中四处徘徊。

历史编纂学如果把当代思想文化中的那些进展仅仅当作一股转瞬即逝的潮流的话,这很不明智。它们倒是更应被视为对历史编纂学自身获取洞见的努力的一个严肃挑战。毕竟,这种努力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涉及这类定位问题的那些问题。对这样一种思想的确证(不仅仅是试图去重构它如何取消自身)还存在吗?或者,更具体地说:作为一门科学学科而为历史所掌管的历史记忆,仍能为未来提出任何有生命力的视角吗?

从一开始起,现代化的进程就伴随着种种定位危机。这些危机对于在文化上伴随着那一过程的解放的承诺,构成了一种不同却可以相比的平衡。只要这样的承诺被人相信,它们便起到了推进现代化的作用。浪漫主义在现代化的形成期中构成了这样一个早期的平衡。历史上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 19、20 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广泛流行的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某些思想根源就在于此。人们还可以列举出许多其它文化现象,它们突出地表现为为了补偿作为文化定位一个关键组成要素的技术 - 科学理性的统治所带来的生活中许多方面的意义缺陷而做出的努力。这样的补偿性努力特别容易在如下场合取得成功:奠基于合理性之上的进步不被视为对未来的一种积极希望,反而被体认为一种失落,即一种从前充斥了同一性的文化生活模式的丧失。

运用这种历史推演,历史编纂学能够尝试将后现代主义与后历史的特质与魅力解释为种种构思。然而,这并不允许历史编纂学回避它们的挑战。它无法将后现代主义留在历史理解的对象层次上,因为后现代主义本身就针对并质疑这种理解的原则。正是通过参与历史思虑的行为,历史编纂学才由此受到挑战去反省它的当前视角与历史记忆策略。在它自身的历史之镜中,它至少能使自己熟悉,在现代历史视角的说服力削弱的余波中,它如今再一次被要求尽力去解决的那些问题。

恩斯特·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把他关于历史主义的著名研究设想为对这样一个挑战的回应。就这种思想可能获得潜力这一传统以回应挑战的种种冲击而论,他的著作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推进的方向:

> 历史教育与历史知识本身的毁坏只能被理解为代表蒙昧主义的一种决定。它只能通过同时在生活的所有其它方面也回复到蒙昧状态来完成。但这并非我们能简单地欲求然后遵行的一件事……毋宁说,它是可悲的、被无限延长了的过时文明的遗产——不是对力量与生机的一个令人喜悦的补偿。我们必须背负我们的重担。我们可以对那一大包东西进行分类和筛选,然后把它扛到肩上。不过因为它包含着我们的一切财富,我们所有的谋生工具,我们不能弃之了事。

对于历史编纂学来说,要大胆面对由后现代主义与后历史的进犯所引起的定位危机,首先需要对先前它借以达到在时间中定位的手段进行详察——这些手段如同今日正受到完全质疑

的那些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弄清楚,如果历史思想的成就都被当作追求思想研究更大程度科学化的现代化潮流的一个结果而遭到拒斥的话,定位的不恰当之处在哪里。

德国的职业历史学家们最近卷入了一场关于如何恰当解释晚近的德国历史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吸引了对历史问题感兴趣的一大群人充分的注意力,由此突出了历史编纂学在当今历史文化中仍旧保有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看上去几乎并未受历史定位功能相对化的影响,社会科学曾一度相当成功地实践了这种定位功能。

根据公众的反响与这场历史学家之争的激烈状况来看,似乎由后现代主义(与它的延伸——后历史)提出的当前历史视角问题已经透过德国人历史定位中一个持续的中心问题这枚棱镜折射并汇聚于此处了:这就是,他们迄今为止还未把握的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过去存在的关系。

然而,在现实中,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在历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中,被标示的前沿相对来说仍然未被历史编纂学就现代性而言所经历的那些反对意见与矛盾触及。历史学家之争完全被包含在这种现代性的边界中了。后现代思想从对当代危机的普遍体验中所吸收、并用于破坏历史思维既定形式的那些不满,在这场争论中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也仅仅是产生了一种非常间接与微弱的影响。历史学家之争也许会使这些形式的历史思维负担过重:例如,当不同的构想涉及到科学方法以及历史编纂学与政治冲突之间的关系,并揭示出理性论证背后的科学性原则所特有的弱点时,便是如此。然而,这并没有超越这些思维形式的界限,这场争论的参与者更是没有越界的意向。历史学家之争作为联邦德国历史文化中的一部分并未反映出任何新的费解性,因为它的论证策略完全包含在了先前发展出的历史编纂学范式之内。对立双方的阵线都标得明明白白,他们各自的立场也能够根据该学科的历史清清楚楚地定位并得到描述。

二、历史科学的现代性

如果我们要去理解与正视后现代主义思想向历史科学提出的挑战,那么我们就绝对有必要解释清楚现代性意味着什么。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历史思想为理解时间体验开启了何种解释潜力?这些潜力的限度——根据现代化过程中目前的定位危机来看必定已被超越了的限度——能够得以彰显吗?

在对历史思维自 18 世纪初以来所经历的发展过程的考察中,我们有可能在现代化过程中区分出三次主要的转换。第一次转换是由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它通过使理性成为历史理解的主体作出历史判断的准则,把人类的理性能力移至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同样,对于历史理解的对象,它把通过理性成为可能的人类文化成就,放到了考虑的中心。

自启蒙运动晚期开始的第二次转换,在历史主义中得到了完全的实现。先前占主导地位的创造历史意义的模式——历史为人生导师(historia vitae magistra)这一口号为范例所表明的模式——如今为另一种模式所取代:发生学的思维。这种新的模式强调变化的方面,使它成为对于人类行为定位确确实实有意义有影响的维度;而这,与所有试图将时间中的进程还原为持续或包含着超时间的有效性原则的潜在因素的做法相反。在这第二次转换中,一种专注于例证的历史思维模式被一种在定位中的发生学视角取代了。

源起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的第三次转换,受到了以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以及社会与结构史为范例的历史思想发展的影响。这里,历史思想在历史经验中开辟了新的社会深度。历

史视角将其注意力从由目的性的人类行为所驱动的事件，转向关注制约行为的变化着的诸要素组合，以及它们之间有条不紊的相互联系。

所有这三次转换都代表了历史思想理性化的各个时期。通过理性化，这种思想呈现出它特有的形式，创造出它自己的自我形象——当然，也获得了科学的威望。历史，作为具有自己的方法与学科特性的一门独立学科，自启蒙时代晚期开始逐渐地明确起来。它随后在历史主义的时代中以明确的形式演变。

直到最近，围绕着这些现代化转换的发展过程都乐于适合那种作为一种进步形式的似是而非的解释。历史思维取得了它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合理性的标准演进了，在各个不同的发展转换中，一个阶段超越下一个阶段：这样它们就把自身解释为一条上升曲线，它标志着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合理性的一种普遍加深与扩展。简而言之，在第一次转换中，历史合理性的这种进步在于，历史研究作为获取知识的方法上的组织程序而得以确立；在第三次转换中，则在于针对历史的有关历史解释的理论构造的发展。

这种进步经历了内在的断裂与错位。理性化中的每一次转换都建立在前一阶段历史意义创造中的缺陷之上，又依次产生了新的缺陷。一瞥这些不恰当之处，将有助于把现代历史思想展现在后现代主义对其合理性标准所作的批判前，并且澄清这种思想是否——以及如何——能够最好地面对这种批判。

晚期启蒙运动与历史主义批判特别是启蒙时代的理性准则中对时间性的考虑不足。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物的多元性与异质性仅仅考虑到了一种从理性的拟自然能力视角而得出的不完全的历史解释。历史主义通过发展与个体性这两个范畴克服了这一不足，但是，当它碰到塑造人类目的性行为的经济与社会因素时，它又苦于经验上的缺陷。标志着历史思想中最后一次现代化转换的不足，乃是一种主体性的匮缺，它与历史经验中近来揭示的社会深层维度相关联。

结果，历史思想现代化的演变也可以概括为一部缺陷或失落的历史。理性化之中每一次相继的转换，现代化过程都产生了对各自的合理性标准而言相应的意义缺陷。演变的前一过程预示，这些缺陷在历史思想新的发展过程中会得到了弥补和消除，这一发展过程可以解释为现代化的一种继续与强化。

今天，情况依然如此吗？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修辞性的，因为后现代主义思想谴责的意义缺陷涉及这种现代化转换中一条反复发生并持继不断的原则：也就是说，历史思想那正在现代化的合理性原则，它对理性、启蒙，以及学科化的要求，对科学严格性的提升。在此，根本上处于危险境地的是方法论上的合理性，它把历史构建为一门相当独立于它的各种变体的科学学科。正是这种合理性，作为人类生活实践之文化定位的原则，已经导致了这种合理性既无法对付又无法理解的境况。

这种境况可以由弗朗西斯科·戈雅的《幻景》(capricho)来说明，这幅画有着生动的题字："理性入睡产生怪物"(The dream of reason produces monsters)。[①]是否方法上的合理性对于理性的现代化构想——一个在历史编纂学作为一门科学发生与形成过程中也被它迷惑了的观念——最终，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怪物呢？它是一个我们根据当代的灾难体验，即使是在历史思想中也必须逃避，以免自我毁灭的怪物吗？后现代主义摆在历史编纂学面前的挑战可以用极端的形式浓缩到这样一个问题中：是否理性的睡梦——历史意识最晚从启蒙运动开始就在做梦了，并且现代历史编纂学正是从中发展而来——现在终于到梦醒时分了呢？它是否变异成了一场梦魇，而在这场梦魇中，进步这一观念的强制力量如今迷惑住了人们的心智，导向了这样一种境地，在其中，沿着先前的进步道路而心不在焉的跋涉只能以灾难告终？

三、历史编纂学中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后现代思维

历史编纂学已经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应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我们有可能对新的时间体验区分两种回应模式及其相应的思维方式。在一种模式中,它通过一种传统主义回避了这些挑战,这种传统主义为解决目前的定位危机提出所谓经过了时间检验的历史解释模式,它寻求"进步的激流中一个可以抛锚之处"。历史编纂学使得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明确化了,并已证明有效的历史参照点能够用上;如今,这些参照点大致的作用是,容纳并引导历史编纂学危机重重的发展历程。

这样的参照点之一是民族这一历史范畴。它是一种思维模式相联系,这种思维模式将民族认同视为历史自我理解的唯一稳定形式,它满足了在当代生活中定位的需求。这一范畴通过对古老的民族传统进行沉思般的回顾,以提出承诺,减轻当代暂时的忧虑。在这一过程中,后现代主义所标示的意义缺陷将通过独特而悠久的民族文化遗产得以弥补。当前对诸时代进行批判的紧张心智将会通过持久的文化传统这贴镇静剂而得到舒缓。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暂时的断裂在那些长时段历史发展的深刻而沉静的连续性中被淹没了,这些发展已经通向了民族自身文化的悠久传统。

不过人们仍然无法在激流的中央抛锚。民族这一历史范畴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早已被粉碎,政治发展使超越民族认同框架的集体历史认同的新形式成为必需。这些集体认同的新形式对于在被统治者的主体性中发展出一种针对政治规则的文化制衡力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政治规则如今在发展各种超民族的形式,因此不应局限于一种平庸的官僚体制,不应受正统中相应缺陷的羁绊。所以,后现代主义风暴之前那种传统主义的平静的诱惑是极具欺骗性的。

然而,历史思维也走了别样的道路。它不仅在现代化的加速运动中寻求暂歇之处,也批判性地审视这一运动,与自身进步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它已经在某种历史批评中应对其承诺与现代化产物之间的矛盾,这一批评显示出通向当今各种生活模式的发展过程的代价与苦难。运用这样一张历史资产负债表,它将现时代的定位危机置于其适当的历史光照之下。这样的思维表明——并且证明如何——发展与进步的传统概念必须根据异乎寻常的历史经验而受到质疑。但是,从传统解释模式中得出的这种历史思维方式能够提供什么来取代那受到质疑的发展与进步构想呢?它是一个一直证明自身不受其社会和人的代价影响的构想。只有在新的历史经验于广阔并包容各个时期的概念框架内被加工的层面,即在各种解释模式对当前的历史定位有作用的层面,才能对如下问题做出判断:是否历史思维自身已经朝后现代主义迈出了一步,或者将来能迈出这么一步。

结果仍然模糊不清。对进步的批判能够导致历史记忆的迸发,它从当今时代的定位问题转向了或多或少得到过描述的历史的逆向图景。通过步(后退)入前现代,避免了朝着后现代主义前进的步伐,或者仅仅是被伪装起来了。在处理现时代危机体验中具有补偿功能的各种文化生活模式,都在一个关键时期即现代早期找到了,这个时期造成了导向当前社会与文化现实的发展。于是,例如,比利牛斯山中的乡村蒙塔尤便呈现为与我们自己的时代相比的一种卢梭式的逆向图景。历史视角以陌生化的方式,从当前时代的起源,转向迷恋那种可想象的另类过去。在历史编纂学对前现代民间文化的表现中有某种与此相类似的东西:它们吸引我们参与那些使我们自己的文化生活模式比照起来显得陌生的历史鉴别。在一个叫做梅诺乔的磨坊主身上,思想上对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运动成果表现的失望在一个历史人物中具体化了:在

梅诺乔身上,所渴望却没能变为现实的未来如今变成了新近发现的过去的某个因素。这也适用于对女巫的女权主义解释:据信巫士代表了现代之始的一种人性观念——一种不断腐蚀的人性,它作为正在现代化的合理性,变异为以现代家长制为主导特征的那种非人性的结构。

有了这种逆向图景的策略,历史思维尽管无法对提供一个认真的解决办法,但它进一步确证了当代定位危机的存在。那个另类过去作为人们自己的"真实"的时代而被忆起——现在显得像是疏远了,像是一个被让渡了的时代。这些逆向历史图景仅仅为人们自己的现在提供了一种消极的定位。它们并不为未来开启任何能够指导其行为用的视角。虽然它们在面临对现代化后果的当下体验时,弥补了现代历史思想的意义缺陷,但是它们并未消除缺陷。毋宁说,它们帮助我们回避了这种体验的严重性与危险性。既然没有任何道路往回通向那令人心醉神迷的历史另类,其历史编纂的想象便如一层令其轮廓蒙胧的面纱一般,降临到了现在的头上。

只要对于现代的这种前现代逆向图景的历史编纂策略保留在彼时对此时(then vs. now)这对反题之内,它就(还)不是后现代的。它只是把现代历史思维的思想发生模式放进了括号里,却并没有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相互联系的另一种构想来取代它。有没有这样的构想,它们以一种后现代的风格,逃避了现代的进步与发展定位思维那种带着诱惑力的影响呢?是不是存在这样的思想形式,它们并不根据变化这一范畴将现在概念化呢?

虽然现在尚无这样一种一致并且易于鉴别的思想结构,但在这个方向上存在着一些很有希望的起点。日常生活史、历史人类学与微观史学体现了一些新的历史思维形式,清楚地显示出某些后现代特征。它们共享这样一种处境,它们不再使用种种发生学的时间范畴,而是更希望用另一种历史视角来取代这些范畴。在日常生活史的范畴中,受历史变化影响的那些主体的自我体验,比起从当代观察者的优势位置出发重构各种变化的分析性建构来说,对历史解释具有更大的价值。客观生活环境的发展线索拼合成了缠绕主体之结。这种起源是从那种主观性视角中来回想的,即从那些作为行动者与(遭受着痛苦的)主体而经历了当下生活环境之起源的人们的体验来回想的。在这种缠绕之中,那一起源失去了作为时间中一个客观方向的特征,而变成了一种主观事实(Befindlichkeit)。那种反映了现代历史编纂学合理性标准的分析性程序不再适用于对它的解释。

在第三次现代化转换中,历史编纂学合理性的进步根据它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是否接近来衡量自身,这些社会科学有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科学,它们将现代化的驱动力作为一个主题来关注;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根据人类学与民族学的思想形式来提升自身。这些科学关注人类生活中无法被归入现代社会起源的发生学构想之下的时间阶段与场所。结果,这些方法特别适用于系统地将关于现代世界起源的历史视角分离出来(verfremden)。它们强调先前根据进步与发展的范畴来解释的那些现象中躲避了该范畴的那些方面,也就是说,它在时间上的独一无二性,它借此来拒绝在现在的史前史的框架内被分类。

微观史的研究方法与表现形式能够为这样一种历史思想方式很好地利用。它们将现象从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向前变化的时间性趋势的情境中除去。这样的方法揭示出,在历史行动者牵涉在内的文化境域中,现象具有的唯一性与独特意义,它与现象作为扩展到整个时代的彼此包含过程中的一部分而具有的方向性意义相对。

当然,拯救这种独特的意义要付出代价。获得它的代价常常是,在历史解释中没有任何理论框架。如今正占据着批评界注意力中心的个体历史现象的宏观历史环境就以这种方式被"抹去"了。历史编纂学过去认为,在一个服务于历史解释的理论框架中工作是其现代化成就之一。这种建构也试图在现代世界的起源中,描绘出潜在于个体历史现象的便于理解的一般

性时间过程。它们概括这些如今在某种历史思维方式面前退却了的宏观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思维方式不再希望根据如此大尺度的过程来表达现象了。以这种建构处理的历史事态并未丧失它们的实在性或有效性,尽管它们失去了以长时段历史过程的理论概念化而具有的那种看似真实的特征。与之相对,它们倒是有成为历史洞见那种难以理解的背景的危险,若是缺少了该背景,历史洞见就会导致错误的构想,导致历史经验的失落。

于是,历史编纂学的后现代转向有了它的贷方与借方。其贷方中是一种过去的独特历史意义的增长。那么这个帐本的借方又如何呢?

四、后现代历史思想的定位缺陷。或:什么是必不可少的?

在历史编纂学向着日常生活史、微观史与历史人类学所作的后现代转向中,基本上仍保留了三个缺陷,即在现代化体验、有启发作用的合理性,以及方法论的理论化之中存在的缺陷。这些缺陷显露出来的程度不同。然而,它们本质上是后现代转换的副产品,这次转换从理论,以及从对聚集在贯穿当代社会与文化现实的全性潮流的那些历史现象所作的宏观历史表达,转向了寻求一种新的理解模式。

(a)相对微观史学而言,现代化经验及其独有的时间动力学对于历史思想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有关现在的历史的自我理解要超越某些限制来定位,而这些限制被表明在现代文化模式的发展之中以宏观历史的形式存在,那么,浓缩在当今社会与文化现实之中的那种历史,其根本维度将会从历史的自我理解的意识中被清除出去。技术进步、对自然的有效掠夺、军备竞赛,官僚体系的完善控制,以及对人类处境的一种纯粹理性主义的解释,这些都将披上一种事物的自然状态的装饰——在这种装饰下,它们就能不再受到批判和反对,继续不受阻碍、不加抵制地茁壮成长。在微观史学中,对历史视角“极其精确的测定”深化了历史可变性。虽然如此,无可争辩的是,这种深化正是以联系现在与过去这一时间纽带的历史经验的广度为代价而得到的。

(b)在历史编纂学内部的后现代思潮中,对于可变性、他者的强化体验的迷恋——通过微观史学研究、日常生活史研究与人类学研究而提升,能够和一种因情感过多而变得非理性的历史文化,以及和类似于用来制造意义的神话创造策略相融合。人们批评在研究中使用史学理论而运用的“冷淡”概念这个比喻,就指向这个方向。面对这样的趋势,历史编纂学不能缺少论证的和话语的理性来充当中介。在历史认同五花八门的多样性面前,如果历史编纂学旨在促进全球社会内部文化内与文化间的理解,以及正在形成过程中的交流网络,那么其他什么样的中介是真正可能的呢?现代史学思想的“冷淡”根本上在于它对各种事实的冷静认识——这是一种把寻求某种历史的“强健”世界的愿望看成有问题,看成走上了历史定位的错误道路的视角。那种不准备为了保持卢梭式逆向图景(与危机时代的当代体验并置)的温情而牺牲方法上的理性的历史编纂,仍保留了某种清醒的来源。

(c)与历史经验碎化成以微观史方式进展的过去的个体图景相对照,就历史经验作为一个整体的范畴分析,这种理论工作历史编纂学是不能缺少的。对于用自下而上的历史来对抗自上而下的历史、用大众历史对抗精英历史、用异己的历史对抗自我的历史,与此相反,所有这些方面之间的联系都不应忽视,并且兼容并包的综合工作也一定不能放弃。这种范畴分析与历史综合需要与现在的一种历史联系,而这种现在涉及的不只是一种与被记住了的另类历史相对的当前社会文化现实的抽象并置。只有当现在与那个如今必定因为对现代性的批判而具

有一种新的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起充实了具体经验的联系，当代的定位危机才能得到解决。人们有理由指责年鉴学派缺乏这种联系性的观念，而这仍旧是反对这一学派内部后现代潮流的一个有效观点。

上述历史思想的思路与视角属于历史编纂学确定的现代方法论原则。但是，这种方法论原则足以消除由对现代性消极后果的体验而带来的定位缺陷吗？先前那套历史启蒙的工具还适用于当前的任务吗？鉴于上文所述历史编纂学转向后现代思想形式为历史思维开启了新的可能，答案看来可能是否定的。不容辩驳的是，在现代历史编纂中坚持合理性标准的历史解释文化，在产生后现代主义的当代体验中已经达到了它的外部界限。

它如何才能超越这些界限呢？抛弃在现代化过程中达到的合理性标准正如把这些标准完全当作其潜在可能性的限制那样，同样是不可能的。如果要避免这两种选择，就必须提出一个关键问题：还有没有尚未挖掘的发展潜力，它存在于作为历史编纂学所经历的现代化转换的产物而形成的历史－解释的理性资源之中呢？历史理性通过历史记忆的中介而为现在的情形充当一种启蒙的资源，那么它在未来又能做些什么呢？前面提到的戈雅的《幻景》恰好能被视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理性不过是一个造成瞌睡的怪物？最后，我愿意试着去唤醒理性。

五、历史理性的觉醒

为了不在隐喻游戏中迷失方向（戈雅的素描——作为某种定位危机的符号——可能陷入的那样），我想分三个步骤系统地进行论证。（a）如果历史理性要“觉醒”，那么重要的是首先去弄清楚“理性”在历史思想中意味着什么。（b）另外，有必要去澄清它的“昏睡”的本质，就是说，它在历史思想内的限制。（c）最后，必须得讲得通怎样才能真正克服这些限制。

（a）当历史意识的意义创造活动中所涉及的历史解释过程与方法被称为“理性的”时，这意味着什么呢？“理性”指的是历史意识的记忆工作中的思想。它指的是历史思想的形式、内容与功能方面。

如果历史思维以一种特定的语言与交往方式进行的话，也就是说，如果这种思想在概念上与方法上得到规定，与经验性体验相联系，并且定位在共识的话，它在形式上便是合理的。“理性”在这里指的是历史思想论证的特征，这与它对科学有效性的要求密不可分。如果历史思维回忆起过去的人性化过程与事件——消除烦恼、不幸、痛苦、压迫与剥削，从给定的或外部强加的限制之下解放出来，增强自主性与参与性，那么它在内容上便是合理的。如果历史思维作为一个定位因素对生活实践及其主体的认同形成过程具有影响，也就是说，如果历史记忆能够发挥作用去促进行动与认同的形成的话，那么它在功能上（或者说在实用上）便是理性的。

（b）在历史思维中，理性的这些潜在可能一般只是以一种相当局限的（“睡着了的”或休眠的）形式，在标志着历史编纂学发展的现代化转换中显现出来。在形式方面，它常常容易求助于历史研究的技艺与方法，并拒斥历史解释中确定的意义准则，认为它在科学之外。然而，尽管如此，历史编纂学仍然允许这样一些准则在历史写作中发挥某种作用，因为缺少它们就根本不可能写出任何一种历史。一种为了合理性而将其选择限制在研究－技术范围内的历史编纂学使得自身毫无防备，并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受到外部权威性意识形态操控命令的支配——而外部在这里几乎总是暗示着“从上面”。历史学家职业化为一位研究专家之后，他毫无疑问扮演了政治家们的捉刀人这一角色，使自己暴露在权力的阴影之下。

然而，在历史思想的现代化过程中也还存在着对理性与合理性的（形式）要求的另一种表

现,历史编纂学对合理性的确定要求应归于这种表现。这些要求能够显得像是全能的或专制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打着科学有效性的幌子,以充分发展了的历史解释系统的面目出现。科学变成了历史意义之创造的手段。但是对于科学有效性的这种要求随即僵化为一种世界观上的独断论,作为意识形态而出现。

在内容方面,当现代化过程中受到限制的理性宣称要去促进人性化与改善蒙昧状态时,它正好造成了相反的情况。于是,与断头台这一符号相联系的历史经验代表了理性的平等原则;欧洲的文明要求变成了帝国主义的蒙昧野蛮,等等。历史记忆只要没有看透这一辩证法,就继续受它的摆布。它通过钳制、压制这样一种意识来宣传现代生活的一条理性原则,这种意识认识到完全非理性的东西恰恰已经在这条原则的名义下发生了,如镇压、强制、恐怖、有组织的谋杀。这种"盲目"理性在历史过程中的例子数不胜数。无论在哪里以自由的名义(被理解为对控制的消除)实行毫无限度的控制,哪里便特别说不准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在功能方面,历史思想正在现代化的合理性,无论在何处,只要它导向基于共识的种种约束,而那些约束将自我感觉与历史认同形成过程中对敌人的想象联系起来,那么,它都必须被看成是非常有限的。它由此创造出了攻击的资源,这种攻击将自我确认系于对他者之他性的否定之上。"否定"在这里被表述为一条行动的原则——也就是说,作为对他者同一性的实际损害,甚至是摧毁。受到历史思想作用的共识形成中的这些约束有大量的例子,比如所有的民族认同形式,它们以不共戴天之仇的形式,将民族的自我确信以强制方式与对异己之物的否定牵扯在一起。

(c)面对这些在现代历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不断重现的对理性的限制,怎样才有可能去设想一种克服这些限制的合理性形式,一种为历史解释"唤醒"并开启新潜力的合理性呢?

在形式方面,可以发掘这样一种潜力,历史编纂学可以尝试在适度而朴实地历史意义创造过程中检验其合理论证的可能性而做到这一点;因为,尽管论证不必放弃它在历史意义创造中所起的作用,意义同样不可能在合理论证的中介里创造出来。恰恰相反,合理论证能够而且必须用来对历史意义的创造进行批判性的检验。由此,例如,它应当被用于反对这种创造的神话创作或非理性形式。当然,要达到这一点,现代历史思想的合理性标准必须扎根于历史意义创造的语言深度之中。它们必须扎根在历史通过历史意识从多重记忆中被勾勒出来的地方。从后现代历史理论的视角看,这一维度在意义创造中只不过涉及修辞学与诗性想象的过程罢了。为了反对这一观点,历史思想的现代性与它对启蒙的相关要求应当被表现出来,并且应当在历史意识的基本叙事模式的框架之中给予它一个基础。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历史理论解释成叙事结构。以这种方式,它们在历史叙事的心智过程中作为内在于叙事自身的一种合理形式的外显,获得了重要性。

这样一种理论化并不意味着暗示历史编纂学具有创造意义的能力,即使它在理性论证中的形式推论原则对于运用意义的基本准则以便在时间中解释历史连续性有一些影响。历史思维若保留一种适度的思想上的谦虚,它就可能敢于将自身囿于科学之外和前科学的意义潜力。历史编纂学可以运用它的方法论方面的推理去保持有历史意义的那些记忆的生命力。在这种情形下,它能重新占有被回想起了的意义(如果它与论证本身所固有的理性概念相符的话)。这样便不会再有论据宣称,旨在保持意义的传统正在被科学思想的合理性所削弱。运用合理性论证的中介,传统甚至可以通过这种论证所固有的合理性而格外地得到加强。在历史思维的现代化变革过程中,历史科学的合理性标准已经增长了,这种合理性标准植(下转第 77 页)

SOUTHEAST ACADEMIC RESEARCH

Journal of Fujian Social Sciences Society(Bimonthly) No.3,2005

President: Ma Zhaonan

Editor-in-Chief: Yang Jianmin

Contents

4	Marx and Engel's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YAN Shuhan
9	Expedite the Government Reform Process with the Goal of Public Function	GAO Shangquan QUAN Yi
19	Top Ten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a's Public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XIAO Wentao
31	Nation and Interest ---- *Four Modern Western Concepts of Nation*	CHEN Binghui
37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and Control System for Its Realization	LU Jingcheng
44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 in the Light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in the Age of the "New Unintelligibility"	Jörn Rüsen Translated by ZHAO Xiezhen Proofread by CHEN Xin
54	Formalist and Contextualist Strategies in Historical Explanation	Hayden White Translated by HUANG Hongxia Proofread by CHEN Xin
67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Frank Ankersmit Translated by CHEN Xin Proofread by HUANG Hongxia
78	Construction of the Economic Zone on the West Coast of the Taiwan Straits: Several Issues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Cooperation and Support System for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Result	GUO Tiemin
85	Market Entry Behavior of Foreign Enterprises and Effect of Market Structure ---- *Exemplified by FDI in Fujian Province*	CHEN Mingsen
98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e of County-Leve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County-Level Economic Growth	SHI Aihu LIANG Xinchao
106	A Research on Reasons for Unemploy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Employment in China	ZHOU Peiyuan
112	Either "Notes on Origin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or "Anthropology Notes" ---- *To Discuss with Mr. Wang Dong and Mr. Liu Jun*	YE Zhijian
121	Enlightenment, Modernity and Modern Risk Society ---- *Mulling Over the Internality of Thoughts of Kant, Foucault and Giddens*	XU Doudou
127	Transference of Vision: Reflections on Modern State Power of Punishment	PENG Hui
134	New Perspective on Environmental Right	ZOU Xiong
144	On Multi-Source Features of Folk Dance in Southern Fujian	CAI Xiangjiang
154	Izawa Shuji and the Inception of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HUANG Xinxian
164	Giving Priority to Grasping Characteristics and Regular Patterns of Loc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 *After Reading "Fujian Education History" by Wang Yusheng*	XUE Dong

目录翻译：潘林峰

ISSN 1008-1569

05>

9 771008 156037

SOUTHEAST ACADEMIC RESEARCH 东南学术

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

〔总第183期〕

2005年第3期

ISSN 1008-1569

CN35-1197/C

定价：8.00